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I
开国创业
KAIGUO CHUANGYE
1949-1956
修订本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 开国创业/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1 (2009. 8 重印)
ISBN 978-7-220-06676-4

I. 中… II. ①郭…②王…③韩…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49~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173 号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

——开国创业(1949—1956)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周 颖 叶 勇 唐海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祝 健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35.75
插 页	3
字 数	603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6676-4
定 价	298.00元(全五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作者名单

- 郭德宏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 盖 军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沈宝祥 中央党校原《理论动态》主任、教授
- 柳建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于 南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 陈雪薇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 王海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韩 钢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陈 述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宫 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王红续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 郭建平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高新民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杨秋宝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曹 普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胡 岩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吕书正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匡家在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沈传亮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崔禄春 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组教处处长
钱 镇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汤应武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佟英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郑 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孙大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张树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李向前 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研究员
张 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庞 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
武国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卜伟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研究员
陈亚杰 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黄 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安建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龙平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张素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研究员
熊亮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林蕴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
高化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
肖冬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员
董志铭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
王 文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二处处长。
邓礼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杨贵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肖石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陈培军 国家文物局局长

- 于化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小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朱文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石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丹慧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印红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戴知贤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永丰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棣华 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朱兆中 上海市宣传党校教授
 吴 萍 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郑有贵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明军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立志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侯松涛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周全华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华清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汪开国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
 罗归国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许剑波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
 高秀清 中共党史出版社副教授

代序^①

龚育之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重新担任他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中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一)

邓的升起，是不是意味着“非毛”？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国人中，一时成为议论的一个中心。

“非毛”，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有它的道理。毛与邓有很深的关系，而这关系又有很复杂的方面。固然，邓的“一落”是因为被教条主义目为“毛派”，邓的出任总书记是毛提的名，这是他“一起”的顶峰，可是，邓的“二落”却是因为毛发动了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邓的“二起”，是毛的战略安排，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

① 本文为龚育之同志2004年8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所写，先后发表于《理论动态》、《文汇报》、《深圳特区报》、《学习时报》等报刊，原题为《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章以大跨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分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阶段，从继承、纠正和创造性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超越。2007年6月12日，龚育之同志因病逝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又恰逢龚育之同志诞辰80周年，重读他五年前的这篇文章，仍令人深思和获得启迪。2003年，本书承蒙龚育之同志应允担任顾问之一。为表达对这位著名理论家、党史学家、教育家的怀念和尊敬，本书编者征得他的夫人孙小礼教授的同意，特以此文作为本书修订版的代序，并向孙小礼教授致以谢意。

下，毛重新起用邓来主持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对邓曾寄予厚望，可是，邓的“三落”又是因为毛对邓的整顿能否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丧失信心，因而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在1976年4月提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批邓撤邓时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老迈而孤独的、被“四人帮”包围、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情绪全不了解的重病之人。

毛另外指定了接班人。但是，对于接班能否顺利，毛并没有信心。据说，毛在逝世前不久向人说：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晓得。

毛逝世不到一个月，毛指定的接班人领导了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为改变中国命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的伟大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要表明新的领导继承毛泽东遗志、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决心，并且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那些指示来论证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正当性和正统性。但在“两个凡是”的框架内，揭批“四人帮”受到很大的局限，毛的错误不能触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不能合乎民心地顺理成章地解决。而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才能为改变中国命运准备好充分的条件。

邓的第三次升起，对“两个凡是”的框架实际上是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此时对毛泽东批邓指示的是非仍然存而不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胜利结束。结束“文化大革命”，深得党心民心，但结束而称之为“胜利”，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发展，这说明，十一大仍然在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但仍把它限定在毛泽东说过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路线，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需要，不能引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造成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二)

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毛泽东二十年来一直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宣布撤销，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接着，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头号人物刘少奇得到平反。中共中央还着手起草文件，准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对建国以来的党的重大历史是非做出系统的清理。所有这些都不得不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在“非毛”的声浪甚嚣尘上。以至于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在她对邓小平的长篇访谈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许多尖锐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中国是不是在“非毛”？

邓对法拉奇的问题，没有回避，没有躲闪，而是坦率地作了回答。

邓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同党内同志先后谈了十来次话。作为起草决议指针的这些谈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

邓深知，不纠正毛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能从现实困境和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大踏步前进。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再也不能悬置或者含糊了，必须把它作为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加以否定。对这以前的重大错误（在历史决议中追溯到1957年以后十年中的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还追溯到1955年的反胡风和批邓子恢右倾）也必须明确地得出结论，不然就不能分清历史的重大是非和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这错误，用文件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的十年中的错误，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还在岸上，还不在于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

邓又深知，纠正毛晚年错误固然是中国前进所必需，但这种纠正如果失去了分寸，如果伤害到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如果否认

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那就会根本违背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根本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感情、理性和良知。正是因为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种纠正搞得不好可能会动摇人们对中国革命的科学信念，才尖锐地提出了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才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不是在“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不是在回避甚至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分清重大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科学基础上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

在长期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下，挺身而出，敢于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纠正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可能引伸开去动摇、否定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形势下，挺身而出，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敢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纠正和继承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

纠正，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属于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这个层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也属于社会主义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继承，指继承毛泽东革命遗产，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成就，它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还包括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层面：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层面。

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包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毛泽东思

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

邓小平在纠正和继承、拨乱和反正这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艺术、政治良心，不但在当时帮助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历史的艰难转折，至今还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这力量，帮助我们一方面不要淡化、不要遗忘历史的沉重教训，更不要离开历史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的真实感受曲意去美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对历史错误揭露的深化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迷惑了我们的心智，丧失了对历史主流、支流和逆流的客观判断力。就是说，要凭借这力量，放开、放高眼界看历史，珍惜中国革命历史和毛泽东革命遗产，沿着邓小平新开辟的道路探索前进。

（四）

全面改革，比起拨乱反正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道路的层面。这就要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重新审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许多传统观念，根据历史经验、时代发展和现代文明成果来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观念。由于同传统观念的若干命题不免发生冲突，这就引起姓“资”姓“社”的一系列争议。

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始，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度。人民公社固然是毛泽东时代独创的制度，包产到户固然是毛泽东时代一贯所不容，但是，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却不限于毛泽东，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传统观念。包产到户的广泛推行，突破了集体化的传统观念，引起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管理形式的一种伟大创造。

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经济特区，在中国和外国社会主义历史上不曾有过。邓小平在赞同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曾经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用这样严厉的语言？就是要说明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可能非常激烈，对它们会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桥头堡的怀疑和忧虑可能非常严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的伟大创造。

这是改革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改革在理论上更有两大突破、两大创造。

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一百年，在这个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劳动所得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毛泽东时代也有过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思想的萌芽，但那时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主要是指比较发达阶段的长期性，而对不发达阶段赋予的内涵仍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基本上排除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原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有很大的变化。这会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混合经济，或者退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继承了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念。

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全面改革，首先的和最根本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点。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异于社会主义的、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时代在八大上、在大跃进后对经济进行调整的时期，也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对局部地暂时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有所放松，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总的趋势是步步收紧，一次又一次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朝着放开市场的方向发展。从十二大确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重新解释计划经济，认为它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到十三大确定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针对理论界有些人又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情况，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就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就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顺利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把它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得到全世界瞩目的崛起，这不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这两大理论创造，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

前提和共同富裕这个最后结果摆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地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改革就不是全面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先富带动后富论，小康社会论，两个大局论（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到一定时候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以及一国两制论，时代主题论，如此等等，结合起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一条明确的路线，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言，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就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的结合，是独特的超越的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伟大创造，追溯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溯源到毛泽东那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始于毛”。标志就是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毛说过：社会主义建设，前几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里说“开始”完全符合事实。所谓“外国的经验”，主要是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当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毛泽东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问题，《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避免走苏联的弯路而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但是说“找到”就言之过早了。毛的探索，取得许多的成果，又经历了巨大的曲折，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对苏联模式，在有所突破中又强化了、绝对化了它的许多根本的方面。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接续毛 1956 年开始的探索，继承了毛的探索的科学成果，又纠正和总结了毛的探索的失败和教训，并且放眼世界，研究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真正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成于邓”。

毛泽东在突破苏联模式方面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和没有做好的事情，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做起来了，而且逐步做好了。苏联模式所依据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僵化观点，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应当加以修正、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所有这些，在新时期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中，逐步得到认真清理、深刻反思和科学的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清理、反思和重新认识的重大的思想成果。

这个理论，照邓小平的说法，没有丢马克思，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而搞清楚这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不丢老祖宗的同时，又必然说出而且已经说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合乎客观实际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话。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更高层次、更新境界的超越。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主要创立者，这个理论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中国革命理论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历次中央全会的纲领性政策性决议，对这个理论的形成、阐释、发挥和发展，对这个理论转化为行动纲领、政策方针、具体措施，做出了共同的贡献。

说“成于邓”，是不是为时过早？就理论说，应该说已经形成，就实践说，也应该说已经成功。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还不能说明这个理论和事业的成功吗？当然，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现实存在的困难，应该全面地看、从仍需努力方面来看，对“形成”和“成功”也应该辩证地看、从继续发展方面来看。邓小平说得好：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进入小康的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21世纪再用五十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中国的邓小平时代，何时结束？通常，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逝世，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时代就以毛泽东逝世为标志而结束。但是，邓小平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倡议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作为中国那个时代的代表者，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他在十三大上实现了“半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出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实现了“全退”。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

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和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特别大的问题上还希望听取他的意见。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是他对特别大的问题发表的系统的、特别重要的意见。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的完全赞同，并被确定为十四大的指导思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发展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从总体特征上说，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阶段，从发展水平上说，是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从深化改革上说，是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说，是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新阶段。新时期的两个阶段之间，不存在历史的断裂和转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所进入的这个新阶段，是坚定地沿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更加有力地向前推进的新阶段。

1993年，将近九十高龄的邓小平，在酷暑盛夏的季节，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听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整理稿。他决定以南方谈话为他的第三部文选的终卷篇。他把这部文选当作一个政治交代的東西，留给他的后继者，留给他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从此，他淡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呢？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当年召开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所作的报告，极其热情、极高程度地评价了邓小平对中国的伟大贡献。把邓小平同毛泽东，以及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大伟人。

（六）

“始于毛，成于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邓以后的时代里继续奔腾向前。

后继者当然要超越前人。这种超越，通常包含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其理论成果，在十六大上表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主题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方面基本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所展开的那些方面，而在每一个主要方面，又都适应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

提出了新的思想和任务。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这个新概括，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十六大进一步把它作为邓以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的总概括。

在这个总概括的统领下，还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任务的提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分析和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论断的形成；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法治国家、政治文明、人权保障的强调；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再振兴的部署，如此等等，展现了邓的后继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多姿多彩的丰富和创造性发展。邓提出过的期望在进入小康的时候着手实施的战略，邓以后条件具备了都开始实施了，邓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强调的观念和战略，党中央领导集体都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适时地提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深层次矛盾，许多发展的瓶颈，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但是，始于毛、成于邓、丰富和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已经找到，前途光明。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奋斗不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序 言

郭德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个春秋，按中国传统旧历，已是足足一个甲子，要开始新一轮干支纪年了。孔子有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如果说，“知命之年”意味着生命的成熟，表示了阅历、知识和经验的丰富性，那么，“耳顺之年”则是意味着生命的从容和淡定，胸襟的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能力。六十年华诞的人民共和国，正是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使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事着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社会的和谐，是多主体的共和，多文化的共荣，意味着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化品格，公正、公平、公开的规则理念。从昨天的“阶级斗争为纲”，到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共和国走过的这个历史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是一场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提出和谐社会目标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具有了进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信心，说明了共和国正在以民主共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来造就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未来气象。

共和国这六十年来发展历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极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实现现代化是贯穿共和国史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从现代化的社会变迁方面讲，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后现代化国家一般存在的共性问题，又有自己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问题。对于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国内条件是十分苛刻的。在外，由于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转入了长期的冷战时期，新中国要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对峙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